

Cyborg宣言：20世紀晚期的科學、技術 與社會女性主義，積體電路中一個女性共同語言 的反諷夢想(An Ironic Dream of a Common Language for Women in the Integrated Circuit)

蘇健華譯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
jhsu123@ms36.hinet.net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149-181.

本章的目的在於致力建立一個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唯物主義的反諷政治神話。可能有許多對神的褻瀆，而不是恭敬的崇拜和認同。褻瀆似乎總是需要把事情弄嚴肅。我知道幾乎所有的立場都是來自於世俗的宗教、美國政治的新教傳統，其中包括社會女性主義。褻瀆保護了一個人於道德主流之中，而又堅持結為共同體的必要。褻瀆不是叛教，反諷是關於在更大整體中未被解決的矛盾，是辨證的，是關於保持不相容的事物在一起的緊張狀態，因為他們是必要且真實的。反諷是關於幽默與嚴肅的競賽，它也是一個修辭的策略和政治的方法，一個在社會女性主義內部我特為推崇的方法。在我的反諷信念中，我的褻瀆行為，就是cyborg的化身。

Cyborg是一個神經機械有機體（cybernetic organism），一個機器與有機體的混合物，一個有如虛構物的社會現實創造物，社會現實存在於社會關係，這個我們最重要的政治建築和變幻世界的虛構物中，國際婦女運動已經創造了“婦女的經歷”，以及所有揭開和未揭開的重

要集合體。這個“經歷”是一個虛構物，同時也是最關鍵的政治性事實。解放構築在意識的、想像性理解、壓迫的以及諸如此類可能性的基礎之上，而這個cyborg是一個虛構物並且其構築了二十世紀晚期婦女的動盪經歷。這是一個生與死的奮鬥，但是在科學小說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邊界只是一個可見的幻象。

當今的科學小說充斥著cyborgs-同時兼具動物與機器的產物，他們殖民於自然和技藝界限不清的世界中。

現代機器也是充斥著cyborg，有機體與機器的結合物，每一個均被認為是編碼裝置（coded devices），在一種親密中，伴隨的不是起源於性慾歷史（傳統）的權力。cyborg的“性”重現於一些厥類植物與無脊椎動物的的可愛複製體中。cyborg複製與有機體的繁殖是脫離的。現代的生產似乎是一個cyborg殖民工作的夢想，一個使泰勒主義的噩夢成為質樸的田園史詩般的夢。並且現代戰爭是cyborg的祭典。編號為C3I，指令-控制-傳播-情報（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intelligence），1984年美國防衛預算達840億的計畫。我建立一個論辯，cyborg如同一個我們社會與身體真實的虛擬映像，也如同一個富想像力的對策，以提供非常有益的聯結。Michael Foucault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是cyborg政治的先啓預告，這是一個非常開放的領域。

二十世紀晚期，也就是我們這樣一個神話般的時代，我們都是怪物（chimeras）。理論化和組裝著機器與有機體的混合物；簡言之，我們是cyborgs。cyborg是我們的本體論，它給了我們屬於身份的政治學。

Cyborg是一個想像和物質現實的壓縮圖象，二者連接起來集中建構了歷史變遷的任何可能性。在“西方”科學和政治的傳統中—種族主義和男性中心主義的傳統；進步的傳統；自然撥付作為文化產品的資源傳統；自我從他人的反映中複現的傳統—有機體與機器之間的關係已經成為一種邊界的戰爭。這個邊界戰爭中的賭注是產品、複製與想像三者的領域範圍。本章是關於邊界的混亂以及其意義的論說。也是致力於促成一種後現代主義者的、非自然主義者的模式中以及在一種想像沒有性別、也可能沒有起源、甚至也沒有結束的世界的烏托邦的傳統中建立社會女性主義的文化和理論，。將討論邊界的混亂以及邊

界建構中的責任。

它也是一種努力，即在一種後現代主義者的、非自然主義者的模式中以及在一種沒有性別、也可能沒有起源、甚至也沒有結束的想像烏托邦世界中建立社會女性主義的文化和理論。這樣的cyborg典型是外在於救贖歷史的。並且不把時間標識在一種戀母情結的(oedipal)記事錄中，而是嘗試用一種共生的烏托邦或後戀母情結啓示來治癒嚴重的性別裂縫。正如Zoe sofoulis在他未出版的手寫稿中關於Jacque Lacan、Melanie Klein 和原子文化(nuclear culture)、Lacklein中討論的那樣，cyborg世界中最嚇人的也是最有前途的怪物，體現於伴隨一種不同的壓抑邏輯的非戀母情結的(non-oedipal)敘事中，而這必須從我們自身的殘存主體來理解。

Cyborg是一種後性別世界的生物，它並非要將兩性體、前戀母情結的(pre-oedipal)關係，未分割的勞動或其他事物，經由最終權力的撥付，將所有部份運載至一個更高的統一體中。某種意義上，cyborg沒有西方意義上的起源歷史--一個“最後”的反諷，始於cyborg也成為“西方”逐步上升的個性化抽象統治的嚇人天啓之傳遞者，一個最終從所有依靠中解放出來的自我，一個精神空間中的人。西方的起源敘事，人道主義的(humanist)觀念依賴最初整體、充分、極樂與恐怖的神話。由所有人都必須分離的生殖母親，以及個人發展和歷史的任務所描述，在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中，這兩個極為相似的神話對我們的印記是強有力的。Hilary Klein討論了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學，在他們關於勞動、個體以及性別形成的概念，信賴於原始單一性的規劃，也就是差異必須被產生並且繼續寫入一個逐漸升高的女性/自然的統治劇本中。Cyborgs快速略過最初單一性的步驟，以及西方意義上伴隨自然而來的身分識別。這就是它的不合規則的承諾，其可能導致如同星際戰爭般的自身目的論顛覆。

Cyborg堅決地忠於偏愛、反諷、親密以及剛愎的特徵。它是對抗的、烏托邦的和徹底非純真的，不再藉由公眾和私人的兩極所結構。Cyborg決定了一個因技術變革而造成的民意測驗，部分立基在oikos，家居社會關係的變革上。自然和文化被重修訂；不再是為他者撥付或

是合併的資源。這個關係從部分形成整體，包括那些兩極、科層的關係在cyborg世界中都成為議題。與Frankenstein's monster的期望不同，cyborg沒有期望他的父親把他從庭院的儲藏室中解救出來，那種形式是通過構建一個異性伴侶關係，通過完成一個完整的整體、一個城市、一個完整體系。cyborg沒有渴望群落於基本的家庭模式，這個時代沒有oedipal特性。cyborg不承認伊甸園，它不是由泥土組成，也不能夢想回歸塵土。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想看是否cyborg能顛覆回歸原塵的天啓。cyborg不是虔敬的，他們沒有牢記整個體系。他們的整體論是謹慎的，並且極少親屬關係——他們看起來有一個團結朝向政治活動的自然氣氛，但是沒有先鋒的黨派。cyborg伴隨的主要麻煩當然是它們是軍國主義和主要資本主義的非正常產物，更遑論國家社會主義。然而非正常產物經常極端地不忠實於他們的出身，他們的父親最終是無關緊要的。

在這一章的最後部分，我將回到cyborgs的科學想像，但是現在我想標示三個重要的分析界限，藉此使得其後的政治—想像（政治--科學）分析成為可能。在二十世紀晚期美國的科技文化中，人和動物間的界限被徹底破壞了。最後僅剩的立足點也已經被污染，即使如果沒有變成遊戲場——語言工具的運用，社會行為、心理事件，沒有什麼能真正具說服力地決定人與動物的區分。許多人也不再感覺到這樣一個區分的必要，甚至，許多女性主義文化的分支強調人和其他生物聯繫的樂趣。動物權運動並非對人類獨特性的非理性否定。他們清楚的識別出跨越自然與文化的聯結方式。過去兩個世紀的生物和進化理論已經同時產生了作為知識主體的現代生物，並把人和動物之間界線減少到只是一個微弱痕跡，其被生命和社會科學之間的思想體系對抗或特定專業的爭論所再深印著，在這個框架內，教授現代基督創生論應該視為虐待兒童的形式而被反對。

生物決定主義者的思想體系只是科學文化中，開放討論人類動物性意義的其中一個立場。有很多激進政治性的人們得以去爭辯突破界限意義的空間。Cyborg恰恰出現在跨越人與動物的界限的神話中。這不同於標識人與其他生物區分的分水嶺，cyborg懷疑地標示並且牢固

地聯結兩者。動物性在這個緊密結合的系列中有了一個新的地位。

第二個有疑問的是介於動物--人（有機體）與機器間的區分。前控制論機器中能是鬼魂出沒的，總是有鬼怪的靈魂存在機器之中。二元主義造就了唯物論和唯心論間的對話，其決定則藉由辯證結果、精神或歷史、根據體驗而來。但是根本上機器不是自我移動、自我設計、自主的。它們不能實現人的夢想，僅能模擬。他們不是（男）人，創作者對於自身，僅是一個男權主義者再現想像的誇張模仿，想像以不同方式呈現偏執妄想。現在我們並不是非常確信，二十世紀晚期的機器已經完全模糊了自然與人工、思想和身體、自我發展和外部設定、以及許多其他的運用在有機體與機器的區分。我們的機器精力充沛地騷動著，而我們自己卻令人擔憂的呆滯。

技術決定論只是一個由機器、生物再集中所開啓的理念空間，如同我們致力於讀寫這個世界的密碼文本。後結構主義者每件事均”墨守成規”，後現代理論因其烏托邦思想，忽視支配的生活關係，是一種戲耍的多變學識，而受到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女性主義者所咒罵。這無疑是後現代主義者的戰略，正如我的cyborg神話，顛覆了大多數有機體的統一體（例如，詩，早期的文化，生物有機體）。簡言之，視為本質的確定性—洞察的根源和清白的保證—是逐漸損壞的，可能是宿命的。解釋的超驗權威喪失了，並且包括了西方認識論背景下的本體論。但是二者擇一不是譏諷或缺失信仰的，也就是，一些抽象存在的變體，如同技術決定論者藉由文本、機器、富有意義的政治行動摧毀人的陳述。cyborgs將是什麼，這是個根本的問題；這個答案是一個倖存的事件。黑猩猩和人工製品也有政治，所以我們為什麼不會呢？（de waal, 1982; winner, 1980 1）

第三個區分是第二個區別的次系列：物體跟非物體間的界限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不精確的。關於一般物理書本中的量子理論推論和不確定原則是一種通俗的科學，相當於作為美國白人異性戀根本變遷的里程碑的Harlequin romances¹：他們弄錯了，但是他們在正確的主題上。現代機器是典型的微電子儀器：他們無處不在又看不見。現代機

¹ The US equivalent of Mills & Boon.

器是一個不羈的突然升起的神，模仿上帝的無所不在和神聖。矽晶片是書寫形式的顯現，它被蝕刻於分子的大小範圍中，其僅被原子的干擾，由於原子刻痕的終極干擾。書寫、權力和技術是西方文明起源敘事長久以來的搭擋，但是微型化已經改變了我們的機界裝置的體驗。微型化結果證明是關於權力的，小帶來的好處並不若其可能招致的危險，就像使用於巡弋飛彈。將50年代的電視機或70年代的新聞攝影機與現今的攜帶式電視與手持攝影機進行比較。我們最好的機器是以陽光為材料的；它們都是明亮而清潔的，因為他們除了信號、電波、光譜系列外什麼也不是，並且這些機器是極易攜帶的、移動的——一個無邊際的人類苦痛在底特律和新加坡，人們不是流動的，並且是物質與不透明體，cyborgs 是蒼穹（ether），第五元素（quintessence）。

Cyborgs的無所不在卻又不可見，正好說明了為什麼這些陽光環繞的機器是如此的致命。它們在政治上的理解如同要實質上理解一般困難。它們是關於意識——或者是它的模擬。他們是飄浮的意義傳遞體隨著貨車跨越歐洲大陸，藉由迫使離開的巫術和非常不自然的Greenham婦女而被有效地封鎖，她們覺察cyborg的權力網絡是非常充分，超乎經由激進份子對擁有自然選民保護的舊時男權政治的努力。最終最艱難的科學，是關於界限最為混淆的領域，純數字、純心靈的領域。C3I，密碼學和潛在秘密的保護。新機器是這樣的乾淨與明亮，他們的工程師是太陽崇拜者，傳達著一個與後工業社會夢想相聯的科技革命。這些純潔機器所引起的疾病“不過”是免疫系統的抗原的編碼變化，“不過”是緊張的感受。東方婦女的靈活手指，因玩偶之家而對維多利亞時代盎格魯薩克遜小女孩的長期迷戀，婦女對這方面傾注的注意力呈現了一個世界上完全新的特點。可能是一個cyborg Alice考慮到這些特點。諷刺地，這可能是非自然的亞洲炸薯條的婦女，在桑塔瑞塔監獄跳舞的cyborgs婦女。他們構成的整體引導了實際上的反抗策略。

所以我的cyborg神話是關於跨越邊界，強有力的融合，和革新者在探尋的可能的危險情勢，就像是必要的政治工作中的一部分。我的前提之一是大部份美國社會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看到的精神和肉

體、動物與機器、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二元論在社會實踐上的深化，符號公式化以及自然加工物與高技術及科學文化相結合。從《單向度的人》(Marcuse, 1964)到《自然之死》(Merchant, 1980)，革新主意者發展的分析策略堅決主張技術統治的必然性及喚醒我們成一個整合抵制的想像體。我的另一個假設是，人們對於用以抵抗世界範圍統治強化的統一體之需求從來就不是嚴重的。但是一個稍微任性的觀點轉變可能可以賦予我們在意義競爭中較佳的能力，而且其他技術居間的權力和滿足形式上也同樣如此。

從某個角度來看，cyborg世界是關於星球控制座標方格的最終壓迫，一個最終抽象概念以防衛名義進行的星球戰爭來具體化，婦女身體在男權戰爭祭典中的最後佔用(Sofia, 1984)。從另一個角度，cyborg世界可能是在於人們不害怕與動物及機器建立親屬聯合關係的社會和物質現實之中，不害怕長久不完全的本體和對立的觀點。政治的努力就是要同時從兩個角度來察看，因為每一都從另一有利位置揭露出難以想像的統治與可能性。單一視角比雙重或多重視角將產生了更錯誤的觀念。Cyborg個體是怪異的和不合常理的；在我們目前的政治局勢，我們很難期望有更多關於反抗和補償(resistance and recoupling)的有影響力神話。我喜歡想像LAG(the Livermore Action Group)如同一種cyborg社會，專注於致力於真實地轉變最激烈體現與噴發出技術啓示之工具的實驗室，並且堅定地建立一個政治形式，其安排希望設法把巫婆、工程師、長老、行為反常者、基督教徒、母親以及足夠長久的解除這個國家武裝的列寧主義者放在一起。“分裂不可能的”(Fission Impossible)是我的這個城鎮親密群體的名稱。

斷裂的身份(Fractured Identities)

已經很難用單一的形容詞來命名某個女性主義了——或甚至是堅持名詞上的每一種情境。透過命名的排除意識是尖銳的，本體似乎是矛盾的、部分的和策略的。伴隨在歷史與社會結構中的得來不易的認可，性別、種族皆無法提供'essential' unity的信仰基礎。沒有任何事是天生就與“女性(female)”連結在一起的，甚至沒有一個稱做是“存在的(being)”女性。它自身在性別科學論述與其它社會實踐上，皆是

高度複雜的類別。性別、種族，以及階級意識是一個藉由家長制、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等對立社會關係的歷史經歷以達到強迫我們的結果。然而，在我們的用語中誰指涉“我們”？哪一個可為這樣一個稱作“我們”有力的政治神話的基礎立場。而又有什麼可以促成招徵募進入這個集體的動機？女性主義者中的引起痛苦的分裂（不是指女性中的分裂）沿著每一個可能的錯誤線路均會產生女性所難以理解的概念，一個成為婦女彼此相互統治的基礎的藉口。對我而言--以及許多分享相似歷史位置的白種人、職業中產階級、女性、激進分子、北美黑人、中年人—政治身分的危機根源是眾多的。近代許多關於美國左派和美國女性主義藉由持續的分割與探索以尋求新的essential unity，對這樣的危機進行回應。但是也有另一種逐漸被認可的回應，透過結合—密切關係，而不是同一（affinity, not identity）。

Chela Sandoval(nd, 1984)從在形成一種喚起非白人女性的新政治表達的特定歷史時機的關注中，已經建構了一個充滿希望的政治本體模式，稱為“反抗的意識”(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藉由抗拒在種族、性別或階級的社會類屬上的固定成員身分，而具有覺察權力網絡的技能。“非白人女性”由於是混合的名稱，因而有起源的質疑，也就是在西方傳統，歷史的意識標示體系中所有關於人的標記的崩潰，構成一種有外在於他物、不同的、具體的後現代主義本體。後現代主義者的身分完全是政治性的。不論什麼都可能被歸於其他可能的後現代主義派別。Sandoval的“對抗意識”是關於對立位置和異質記事錄，不是關於相對主義和多元論。

Sandoval 突顯驗明誰是一名非白人女性(a women of colour)的實質標準的缺失，她注意到該群體的界定已經被挪用為具有否定的意義。例如，墨裔美國人或美國黑人婦女已經不能說成一個婦女或一個黑人或一個墨裔美國人。因此，她成為負面身分階層的底層，從被稱作“婦女和黑人”的類別中被省去，而主張進行重要的革命。這個類別“婦女”否定了所有的非白人婦女；“黑人”否定了所有的非黑人，及所有的黑人婦女。但是仍然沒有“她”，沒有特點，但是大量的差異存在於那些宣稱其歷史身分的美國婦女之中，如同美國的非白人女性。

這個身份制定出一個自我意識的構築空間，其不確認基於自然關聯的行動能力，而是基於意識聯合的、密切關係、政治血親。和部分美國白人婦女運動流派中的“婦女”不同，在此沒有基礎的歸化，但至少這是 Sandoval 提出透過“反對意識”的力量才是唯一有效的途徑的論證。

Sandoval的討論可以視為一個遍及世界發展反殖民主義論述的有力女性主義構想；也就是說，論述分解了“西方”和它的重要成果——其不是動物，野蠻人、或婦女，男人（man），而是，歷史秩序的創始人。如同東方學在政治學與符號學中被解析，西方的本體也不再安定，其中包括那些女性主義。Sandoval對“非白人女性”的論點有機會建立一個不複製帝國主義的有效連合體，將先前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革命主題進行整合，其不需特別應對從非殖民地化而來的雜亂結果。

Katie King強調鑑別的局限和在“詩”的閱讀中建立政治的/詩的認同的機制，那也是文化女性主義的生產核心。King批評了在當代女性主義中的固執傾向，從女性主義實踐的不同“重要時刻”或“對話”，到婦女運動的分類，都製造某種屬於自己的政治傾向，並且讓它看起來是完美的整體。這些分類傾向於改寫女性主義歷史，爲了如此它看起來像是一個在跨時代連接類型中的意識形態鬥爭，特別是那些典型單位，如激進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和社會女性主義的。實際上，所有其他女性主義若非合作就是相互排斥的，通常是通過建立一個清晰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女性主義的分類製造認識論以管制形式上婦女經驗的越軌。當然，“女性的文化”，如同非白人女性一樣，被藉由機制誘導偏好來有意識地創造。詩、音樂、某種形式的人文古典學科實踐的慣例是顯著的。美國婦女運動中的種族和文化政治中親密地交織在一起。King和Sandoval的共同成就是學如何不依賴撥付、合併、分類鑑別的邏輯，精巧製作一個詩/政治的統一體。

理論和實踐上對抗統治的統一體（unity-through-domination）或合併的統一體（unity-through-incorporation）之爭鬥，不僅諷刺地侵蝕了父權制、殖民主義、人道主義、實證主義、本質論、科學主義和

其他主義的正當化基礎，而且都要求有機的或自然的觀點。我認為激進主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認識論策略也都逐漸腐蝕，而且這是在介入想像可能統一體中，具有至關重要價值。它能夠看到是否所有西方政治人們所知道的認識論使我們無法建立實際有用的密切關係。

對於建立革新立場的努力是值得被注意的，認識論如同人們改變世界的成果，已經成為展現認同界限的部分過程。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刻畫工具和關於革命議題的本體論論述的建設性工具，可以被視為一種殘存偏好，消融中西方自我的反諷結盟。我們痛苦地意識到它所意味著有一個歷史構建的body。但是由於我們血統清白的喪失，也沒有從花園(Garden)中排除。我們的政治失去了伴隨清白天真的罪惡豁免。但是另一個關於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政治神話看起來像什麼呢？哪種政治將擁護部分的、對立的、永久開放的個人和集體的自我的建構，並且仍將是忠貞的、有效的，也是諷刺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我不知道歷史上其他的時代有著對有效的種族、性別、性徵和階級的統治的政治統一體的需要，我也不知道其他任何時代我們可能幫助建立的那種統一體成為可能。”我們”中沒有人能再對任何”他者”，有著支配實在之形構(shape of reality)的任何象徵的或有形的能力。或至少我們不能由這樣的統治中宣稱純粹。白人婦女，包括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發現了婦女類別的不純粹。此覺察改變了所有先前類別的局勢；它使它們改變本質就如同熱使蛋白質變形一樣。Cyborg女性主義者主張，”我們”不需要任何統一的自然母體，而且沒有建構物是完整的。純粹，以及推論強調犧牲者的狀態作為洞見的唯一背景，已經被充分破壞了。但是構建的革命主體必須對二十世紀晚期的人們有著同樣的考量。在身份的衝突和構建他們的反思戰略中，對編納某事產生開放的可能性，而非預言救贖歷史將終止之天啓末日後的裹屍布。

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激進女性主義皆同時歸化並使”婦女”類別和“婦女”的社會生活產生質變。或許一個簡要的諷刺文

可以突顯出這些發展。馬克思社會主義深植於階級結構的工資勞動的分析中。工資關係的結果是系統的異化，就如同工人與他的產品分離。抽象和假象支配了知識，也在實踐上支配規範。勞動是一個特別的類別，在其中馬克思戰勝假象，並且找出世界必須改變的觀點。勞動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教化活動；勞動是一個允許知識為主體的本體論類別，抑制與異化的知識。

在可信的起源鑑別中，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藉由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分析策略相聯合而提升。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主要成就，就是擴展了提供婦女勞動的類別，甚至當薪資關係從屬於資本主義父權制度下所包含的勞動觀念時。尤其是，婦女的家務勞動和如同一般作為母親所從事的婦女活動（也就是，在社會女性主義意義上的再生產），進入了類似於馬克思勞動概念的理論中，婦女統一體建立在”勞動”本體論結構的認識論基礎上。馬克思/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沒有使這統一體歸化；它是一個根植於社會關係基礎上的可能立場的可能的成就。其根本性進展存在於勞動或是類似情況-婦女的活動的本體論結構上。馬克思人文主義的傳統，和它的同類西方思想，對我來說是個難題。這些構想中的貢獻已經強調了實際婦女發展整體的日常責任，而不是使他們歸化。

Catherine Mackinnon的激進女性主義版本自身即為對西方理論關於身份基礎功能的撥付、合併、整體化傾向的一種諷刺文。近來將所有名為激進女性主義的各種“運動”或”對話”，同化入MacKinnon的觀點之中，這是實際上以及政治上的錯誤。他的理論的目的論邏輯展現出認識論和本體論-包括他們的對立面-如何抹去或維持差異。MacKinnon理論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改寫激進女性主義的多元領域歷史。主要的影響在於提出關於婦女本身的經驗性理論，這是所有革命立場的一種啓示。也就是，整體化建立於激進女性主義達成它的目標（婦女的統一體）這種傳說之內—藉由實行這些經驗以及證明到激進的非存在。對於馬克思/社會女性主義者而言，意識是一個成就；而不是一個自然事實。並且Mackinnon的理論消除一些建立於人道主義革命主體的難題，但是其代價為徹底的化約主義。

MacKinnon認為女性主義必須採取一個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分析策略。首先不看階級的結構，而要看性/性別的結構以及它的生殖關係。男人的建構以及婦女性別上的撥付。諷刺地，MacKinnon的“本體論”建立了一個非主體（a non-subject），非存在（a non-being）。另一個渴求，不是自身的勞動，而是“婦女”的起源。她因而發展一個意識的理論關於“婦女”的經驗的認定—任何被視為性（別）的侵犯的事，甚至於，性的自身和“婦女”一樣被關注。女性主義者的職志就是這種意識形式的建構；也就是我自身不是什麼的自我知覺（self-knowledge of a self-who-is-not）。

倔強地，性別撥付在女性主義中的勞動議題中仍具有認識論的地位；也就是說，從這些分析所指出的觀點有助於促使世界改變，但是性（別）的主體，不是異化，而是性/性別建構的結果。在知識領域中，性（別）客觀化的結果是假象與抽象。然而，一個婦女不是簡單地與她的產品分離，而是自從她作為一個性別撥付的婦女而存在時，從深層意識上沒有作為一個主體存在，甚或是一個潛在的主體。是被他人的期望所建構的，而不是如勞動者從他的產品中不正當分離出來一樣的異化、疏離。

MacKinnon的激進的經驗理論整體化到極致，它沒有如其他婦女政治專家所說和所做般的非常侷限於社會邊緣。它是一個整體化創作，產生了西方父權制中所從來沒有做的--婦女的非實在（non-existence of women）的女性主義意識，而非作為男性渴求的產物。我認為MacKinnon正確地論及否定馬克思主義中身份可以穩固地以婦女統一體為根據這一觀點。但是在解決任何方面西方女性主義的革新議題的矛盾問題時，她發展了一種更獨裁主義的經驗原則。如果我對於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抱怨，是他們無意間消除了多元性、未同化的，根本的差異，清晰顯現於反殖民的論述和實踐中。MacKinnon通過“本質化”非存在婦女的手段，有意識地消除所有的差異是不可靠的。

在我的分類法中，如同任何其他分類法是一種歷史的重新刻畫，激進女性主義能關注到所有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所列舉如同勞動形式

的所有婦女活動，只要這些活動可以被性別化。再生產有著兩種意義上的不同立場傾向，一個植根於勞動，一個植根於性（別），都受到統治的結果和社會的無知以及個人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召喚。

綜觀任何作者討論的困難或貢獻，馬克思主義或激進女性主義的觀點都沒有包含局部狀態解釋的傾向，而皆慣常地以整體來建構。西方的解釋總是要求儘量更多，而“西方”作者總希望能涵蓋到其他人所說的。各自試著透過類推、簡單的列舉或增加的方式擴展它的類別，以增添其它的統治形式。關於白人激進主義和社會女性主義者中關於種族的困窘沉默是一主要的、破壞性極大的政治結果。歷史和多音性（polyvocality）²消失而進入試圖建立宗譜的政治分類學中。在理論上中沒有種族（或是其他）的結構性空間，要求揭示類別婦女和社會群體婦女作為一個整體的建構分類，我的諷刺文的結構看起來似乎是這樣的：

社會性女性主義：階級結構//薪資勞動/異化勞動,藉由類比再生產 (by analogy reproduction)，通過擴展性別(by extension sex)，通過附加種族(by addition race)。

激進女性主義：性別結構//性別的萬用//使性別客觀化，通過類推勞動 (by analogy labour)，通過擴展再生產 (by extension reproduction)，通過附加種族 (by addition race)。

在另一種脈絡下，法國理論家Julia kristeva聲稱婦女作為一個歷史群體出現是在二戰之後，與青年群體同時。她的指出的時期是令人質疑的，但是我們現在已習慣於記住知識和歷史的重要參與者，“種族”（race）並非總是存在，“階級/層”（class）有一個歷史的起源，然而”同性戀”(homosexuals)是相當近期才出現的。男性家庭的象徵體系—和女性本質—同時在這星球上所有人網絡般連結是空前多樣、有創造力和複雜的這時刻崩解，這一現象不是偶然。“先進資本主義”（Advanced capitalism）不足以表達這個歷史時刻的結構。在“西方”意義上，人（Man）的最終是在危急關頭的，婦女從婦女中分離出來

² 也就是異質性。

在我們的時代不是偶然的。或許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在產生其根本性理論（抑制婦女的特質與對立的關注）時並無實質上的過錯。我認為我們已經是至少透過在邏輯、語言文字、白人人道主義實踐中的參與；以及透過對個別支配立場的探索，以保障我們革新的願望。現在我們幾乎沒有藉口。但是在我們尚且不足的意識下，我們冒險陷入無限的差異中，並提供熟悉造成部份的、完全的之聯繫這一任務。一些差異是不必當真的；而有一些則是世界歷史統治體系的指導原則。“認識論”就是關於差異的知曉。

統治的資訊學 (The 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

在嘗試獲得一個認識論與政治上的態度（political position）時，我想要概略描述一個可能統一體的圖像，一個受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設計原則影響的圖像，我的概略描述的架構，在與科學與技術密切相關的普存社會關係中，範圍與重要性重組的背景下所確立。我將討論一個政治，其主張階級、種族、性別本質的基礎原則改變，在新興的世界秩序體系中，其新奇經驗與範圍可與工業社會所創造的相類比；我們正在經歷一個變遷，從有機的、工業社會走向多形態的、資訊系統。—從工作到遊戲，一個致命的遊戲。在這同時，物質和意識的二分，可能在下面的變遷圖表中明確描述，即從安定的舊時期的統治階層，向引起驚慌的新網路結構變革，也就是我所稱的統治的資訊學：

再現(Representation)	模擬 (Simulation)
中產階級小說，現實主義 (Bourgeois novel, realism)	科幻小說，後現代主義 (Science fiction, postmodernism)
有機體(Organism)	生物構成要素 (Biotic Component)
深度，完整(Depth, integrity)	表層，邊界(Surface, boundary)
熱(Heat)	噪音(Noise)
臨床實踐的生物學 (Biology as clinical practice)	作為標題的生物學 (Biology as inscription)
生理學(Physiology)	通訊工程學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小群體(Small group)	次系統(Subsystem)

完善化(Perfection)	最佳化(Optimization)
優生學(Eugenics)	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
衰微，魔法山脈 (Decadence, Magic Mountain)	廢棄，未來震盪 (Obsolescence, Future Shock)
健康衛生(Hygiene)	壓力管理(Stress Management)
微生物學，肺結核 (Microbiology, tuberculosis)	免疫學，愛滋病 (Immunology, AIDS)
勞動的有機分工 (Organic division of labour)	人類工程學/勞動控制學 (Ergonomics/cybernetics of labour)
功能專殊化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組合式的建設 (Modular construction)
繁殖(Reproduction)	複製(Replication)
有機性別角色專門化 (Organic sex role specialization)	最佳的基因策略 (Optimal genetic strategies)
生物決定論 (Biological determinism)	進化惰性，限制 (Evolutionary inertia, constraints)
社群生態學(Community ecology)	生態系統(Ecosystem)
種族生存鏈(Racial chain of being)	新帝國主義，聯合國人道主義 (Neo-imperialism, United Nations humanism)
家庭/工廠中的科技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home/factory)	全球工廠/電子村舍 (Global factory/Electronid cottage)
家庭/市場/工廠 (Family/Market/Factory)	積體電路中的婦女 (Women in the Integrated Circuit)
家庭工資(Family wage)	可比較的價值 (Comparable worth)
公/私(Public/Private)	cyborg 公民(Cyborg citizenship)
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	不同領域(fields of difference)
合作(Co-operation)	交流增加 (Communicatins enhancemenet)
佛洛伊德(Freud)	拉康(Lacan)
性(Sex)	遺傳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
勞動(labour)	機器人學(Robotics)
心智(Mind)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第二次世界大戰 (Second World War)	星際大戰(Star Wars)
白人資本主義系譜/家族	資訊統治

(White Capitalist Patriarchy)

(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

這個列表暗示了一些有意義的事，首先，右邊的項目不能被用“自然”標示，這種理解也同樣轉變了左邊的自然識別。我們不能走回意識形態上或是物質上。它不只是”(男)神”的死，也是”女神”的死。或兩者都復活在微電子和生物工藝學政治統治的世界。關於如同生物構成要素的物體，我們不能就本質屬性方面來思考它，而是由設計、限制的界限、流動率、系統邏輯、降低限制的成本方面來思考。性的再生產是許多種依系統運行成本和利益考量的再生產策略之一。性的意識形態再生產，不再能如同有機體或是家庭的自然整體一般，繼續採用性(別)和性別角色的概念。這樣的推理將被揭開假面具，如同荒謬的、反諷的共同閱讀花花公子以及反色情的激進女性主義者將成為在揭開非理性主義的面紗奇異的夥伴。

同樣之於種族，關於人類的差異的意識形態無疑是一種參數的公式化描述，如例如血型或是智商。尋求如同未開化與開化的這樣概念的行為是“不理性的”。對於自由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尋找整合的社會體系對一種稱做”實驗人種學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的新實踐讓步。在其中，有機物體消失於寫作的扮演方面的關注之中。在意識形態的層次，我們看到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轉化為發展和低度發展、和現代化的評等與限制的表達方式。任何對象或人藉此都可以合理地被拆解與重組，非“自然”建築結構壓抑了系統構思。所有世界城市中的金融行政區，如同加工出口和自由貿易區一樣，顯示了“晚期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能被合乎科學地認知的整個物體宇宙，必須被規劃為通訊傳播工程學(為了監督)和文本理論(為了想反抗的人)的問題，這都是cyborg記號學 (semiotics)。

人們應該期望控制策略集中於邊界條件和分界面，集中於跨邊界流動的比例；而不是自然物體的完整。西方自我的“完整 (Integrity)”或“純真 (sincerity)”對判斷程序和專家系統退讓。舉例來說，應用於女性生育力的控制策略將在人口控制和個人決策目標達成最大化的方面進行發展。控制策略將被稅率、成本控制、自由的程度所公式化地描繪。人類，如同其他零組件或次系統一樣，必須被局部化進入

其基本操作模式是概率、統計的系統結構中。沒有物體、空間或身體在自身中是神聖的；如果有適當的標準、適當的編碼任何元件都能和其他元件相接合，而且也能經由加工而成爲普遍的表現形式。世界中的交流超越了被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市場影響的普遍轉移。影響世界各種元件的特殊病因是壓迫（stress）—通訊傳播的破壞，（Hoghess, 1983）。cyborg 並沒有屈從於 Foucault 的生物政治；cyborg 模仿了政治，一個更強有力的運作領域。

這種科技的分析和自二次戰後由歷史觀點中顯現的知識的文化客體使我們注意到一些在女性分析上的重要不足，而這種分析是依照西方自從亞里斯多德規定的有機的，科層制度的二元主義秩序對話而進行的。他們可能被拆解，或如Zoe Sofia（Sofoulis）可能的放置它，他們已經被“技術—消化（techno- digested）”了。精神—肉體、動物—人類、有機體—機器、公—私、自然—文化、男—女、原始—文明等二分法都在意識形態的討論中。婦女的實際處境是他們整合/開發入一個生產/再生產的世界系統以及稱爲資訊統治的交流中。家、工作場所、市場、公共活動場所、身體自身—全都能被用幾乎無限和多樣的方式分散和接合，對婦女和其他人的一個重大的結果是各種人間的差異，並造成難以想像並且是生存必要的有力國際性反抗運動。重建社會主義-女性政治的一個重要路線是藉由付諸於科學技術的社會關係的理論和實踐，包括重要的神話體系和構築我們想像的意義。Cyborg是一種拆解與重組，後現代集合體和個人自我，這是女性主義必須編碼的自我。

通訊傳播技術和生物工藝學是要重建我們身體的關鍵工具，這些工具體現和實施了新的婦女世界範圍的社會關係。技術和科技的論述能部分地被定型化的理解，也如同冰凍的瞬間，流動的社會互動構建他們，但是他們應該被視爲執行意義的器械。邊界是可滲透的，在工具和神話，儀器和概念，社會關係的歷史體系和可能事物的歷史解剖中，包括知識本身。確切地說就是神話和工具互相建構。

再者，通訊傳播科學和現代生物學被一個共同的進展所建構—世界轉化進入一個編碼問題，所有抵制工具主義控制的共同語言的尋求

也消失了，並且所有的異質體都能夠被拆解、重組、投入和交換。

在通訊傳播科學中，世界轉化成編碼問題可以在控制學（迴饋控制）系統理論應用在電話技術、電腦設計、武器部署或資料庫建設和維護中來得到說明。在每一個案例中，關鍵問題的解決依賴於語言和控制理論；關鍵的操作是決定速率、方向和資訊流量的可能性。世界被可滲透資訊的不同邊界面再細分。資訊是那種可計量的元素（單元，單位基礎），其允許普遍的轉譯，技術權力也不再遮蔽（稱為有效交流）這種權力的最大威脅是交流的中斷。任何系統的破壞是一種壓迫的功能，技術的基本原則能被壓縮進隱喻C31，命令—控制傳遞—智能，當成其操作理論的軍事象徵。

在現代生物學中，世界轉化成編碼問題可以被分子遺傳學、生態學、社會生物進化理論，以及免疫生物學所說明。有機體已經被轉化成基因編碼和讀出問題。生物工藝學，一種書寫形式技術，形成了廣泛的研究。就某種意義來說，有機體已經終止了如同知識的客體般的存在，退位至生物元件，即為一種專門的資訊處理裝置。生態學的類似變動能藉由探尋生態系統概念的歷史與效用所檢視。免疫生物學和相關的醫學實踐是作為知識客體的特殊編碼和認知體系的豐富範例，也為我們自身構築身體的實際存在。生物學在這兒是一種密碼學。研究必然是一種智力活動。反諷大量存在。一個壓力體系扭曲了；它的溝通程序崩潰了，它在自我與它者之間的認識力衰退了。擁有狒狒心臟的人類嬰兒引起國民在倫理上的困惑—至少對動物權益推動者以及人類純潔的衛道者而言是如此。美國的同性戀男性和毒癮患者都是標示（刻劃在身體上）邊界混亂和道德污染的免疫系統不健全的特殊犧牲者（'privileged' victims）(Treichler, 1987)。

但是這些涉足入通訊傳播科學和生物學的研究是稀少的，一個世俗的、大量的經濟現實支撐我的宣稱，即這些科學和技術為我們指出了世界結構中基礎的變遷。通訊傳播技術依賴電子學。現代國家、跨國企業、軍事力量、福利國家機構、衛星系統、政治運作、我們想像力的創造、勞動控制體系、我們身體的醫學建構、色情業，國際勞動分工和宗教福音傳道都緊密的依靠電子學。微電子學是幻象的技術基

礎；也就是說，微電子學是沒有源頭之模擬的技術基礎。

微電子技術居間使勞動轉化進入機器人學和文字處理，把性(別)轉化成為基因工程和再生產技術，人的心智也轉化成為人工智慧和判斷程序。新的生物技術關心的不再只是人類的繁殖。生物學作為重新設計物質和程序的強大的工程科學，對工業有著革命性的影響，今天在熱門領域，農業和能源領域最為明顯。通訊傳播科學和生物學是知識的自然技術目標的建構，其中，機器和組織之間的分歧難以清楚辨別；大腦，身體和工具聯繫也很緊密。跨國公司的生產、日常生活的再生產、符號系統的生產、想像力與文化的再生產似乎同樣有關聯。基礎和上層結構的、公共和私人的，物質和意識的邊界維持影像從未如此脆弱過。

我運用Rachel Grossman (1980)積體電路中的的婦女形象，來描述婦女在世界中的境遇，這個世界通過科學和技術的社會關係得以全面地重建。我用新的遁辭（婉轉的陳述）“科學和技術的社會關係”來指出我們不是技術決定論者，而是在處理一個依靠人們之間被建構關係的歷史體系。但是這個說法也應該表明科學和技術提供了新的權力源頭，我們需要新的分析資源和政治行動(Latour, 1984)。植根於高技術促進的社會關係中的種族、性別和階級的一些重組，能使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更有效地推動革新政治。

“家庭”之外的“家庭工作經濟”³

(The 'Homework Economy' Outside 'The Home')

“新工業革命”正在產生一個遍及世界新的工人階級，和新的性別特徵以及種族劃分。資本的急速流動性和新興國際勞動分工與新集體的出現和常見群體的削弱交織在一起。這些發展既不是性別中立也不是種族中立。先進的工業社會中的白人男性近來變得較易長久性失業，婦女並未同男性一般比例的在工作變動中消失。這並非簡單地歸因為第三世界國家女性的勞動力較受到技術基礎跨國公司（尤其是電子領域）的出口加工部門所喜好。這圖像更具系統性，並且包括再生

³ 或稱“副業經濟”。

產，性別特徵，文化，消費，和生產。以矽谷為典型，許多婦女的生活已圍繞著電子工作就業而建構，她們親密關係的實際情況包括一系列的異性一夫一妻制、協商照顧小孩、與親屬的疏遠或傳統的社區多種其他形式、單身的高度可能性及當她們老年時極度的經濟脆弱性。矽谷婦女在民族和種族的多樣性構成了在文化、家庭、宗教、教育和語言上衝突的差異的縮圖。

Richard Gordon稱這個新情況為“家庭經濟”。雖然他函概了現在出現的與電子裝配線聯繫的自由家庭工作的現象，Gordon用“家庭工作經濟”來命名工作的重組，這種工作具有以前被歸於女性工作，僅僅由婦女來做的工作的特徵。工作本質上被重新定義為字面上女性的或女性化的，無論是有男人還是女人來做。女性化的意義就是將是非常脆弱的；婦女能夠被解散，重新召集，作為預備勞動力來利用；把（她們）看作比服務人員更低等的工人；屬於斷續的薪資工作安排，也就是無益的有限工時工作；導致一種總是近似猥褻（*obscene*），不相稱的，可降低的性別實在。低技術化是近來被運用於某些的工人的舊策略了。但是，家庭工作經濟並不僅指大規模的低技術化，也不否認高技術性的新領域正在出現，甚至是對以前被排除在熟練技術就業之外的男性和女性來說也是如此。而且這個概念暗示了工廠，家庭和市場在一個新的水平上整併，並且，婦女的地位是重要的一並且必須針對婦女之間的差異以及在各種情況下男女之間關係的意義加以分析。

家庭經濟作為一種世界資本主義組織結構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新技術所造成。攻擊相對享有特權的、大多數的白人、男性具有工會組織的工作的成就，是不理會新通信傳播技術的權力對於勞動的整併與控制，任憑這些權力廣泛的擴散和去中心化。新技術造成的結果，藉由婦女們在家庭（男性）薪資損失和她們自身工作的性質方面感受到，她們的工作變得資本密集；比如說辦分室工作和護理工作。

新的經濟和技術的安排也與正在衰落的福利國家有關，並且也與隨之加劇婦女承擔自身、男人、孩童、老人日常生活的需求。女性化的貧窮——產生於日益瓦解的福利國家和家庭經濟，此時穩定的工作已

成爲例外，並且由婦女的工資在承擔養育孩子方面無法與男性相比的預測是可以證明的——這已成爲急切的焦點。導致各種各樣的女性戶長家庭的原因是種族、階級或性徵的作用；但是正在增長的主要部份是由於婦女在許多問題上參與。婦女們習慣地承擔日常生活一定程度上是因爲視她們如同作爲母親的身分，這種觀點已不是新的了。那種與全面的資本主義和日益增長的以戰爭爲基礎的經濟整合的觀點是新的。這種特殊的壓力，舉例來說，美國黑人婦女，她們已經逃離了無報酬的家庭服務，現在她們大多數從事著神職工作和類似的工作，這暗示著黑人就業的不足。第三世界工業化地區年輕女性逐漸發現她們自己是她們家庭現金收入的唯一或主要的來源，儘管工作機會始終是不確定。這些發展必定有在心理機制以及性別和種族政治的重要後果。

在資本主義三個主要階段的框架裏（商業/早期工業，獨占壟斷，跨國公司）——與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跨國主義相連繫，並且與Jameson的三個主要的美學時期，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有關——我將論證與資本形式和他的政治文化相伴物有關的特殊的家庭形式。雖然這些家庭形式的存在充滿了問題和不平衡，但這些家庭的理念形式可以被歸類爲（1）家長制核心家庭，由公共和私人間的二分構成，並且伴隨著白人資產階級單獨領域的意識形態，和19世紀英裔美國人資產階級的女性主義；（2）由福利國家和制度居間調節（或加強）的現代家庭，這些制度包括家庭工資，伴隨女性主義異性戀意識的成熟，包括圍繞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格林威治村表現出的種族觀；（3）家庭經濟的‘家庭’伴隨著婦女領頭的家務工作的矛盾結構和它的女性主義的擴張以及性別本身自相矛盾的加強和腐蝕。

這是一個脈絡，突顯由新技術產生遍及世界的結構性的失業是家庭經濟圖像的一部分。在先進國家，機器人和與相關的技術把男人從工作中排除出來，加深了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衰退，以產生男性工作的缺乏，即使在勞動力剩餘的國家裏辦公自動化也成爲制度，工作的女性化加強了。美國的黑人婦女熟知面對黑人男性的結構性失業（“女性化”），和她們自己在薪資經濟中高度脆弱的地位。性徵，再生產、

家庭和團體生活與大量區別白人與黑人婦女處境之手段中的經濟結構交織在一起，這再也不是個秘密。越來越多的男人和女人將對付類似的處境，這將使基本生活支持的問題上的跨性別與種族的結盟成為需要，而不僅僅是偷偷的探詢。

新技術對饑餓和為了維持世界生存所需用的食物生產也有深刻的影響。Rae Lesser Blumberg (1983)估計婦女生產大約50%的維持世界生存的食物。婦女被排除在增長了的高技術食物和能量作物的商品化的獲益之外，她們的日子更加艱苦，因為她們提供食物的責任不會減少，她們再生產的條件變得更加複雜。綠色革命技術與其他高技術工業生產相互作用，來改變勞動的性別歧視和不同的性別移民模式。

新技術似乎深刻地牽涉於Ros Petchesky (1981)分析的”私有化”形式之中，其中，軍事化，右翼家庭意識形態和政策，以及加強法人的（和國家）資產的界定如同私人的互動一般。新通訊傳播技術是對每個人消滅”公共生活”的基礎。這促進了大多數人在文化和經濟花費上長久性高技術軍事設施的急速增長，特別是婦女。如同電視遊戲和小型化電視之類的技術似乎對”私人生活”的現代形式的生產是至為關鍵的。電視遊戲的文化大量以個人競爭和宇宙戰爭為目標。高技術、性別的想像在這裏產生，從這些推理，想像出行星的毀滅的和科幻小說。不只我們的想像被軍國主義化了；其他的電子和核子戰爭的現實也不可避免。這些就是保證最終的流動性和理想交流的技術—而且不經意地帶動旅遊業，理想的流動性實踐和交流，顯現出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單一產業。

新技術影響了性別和再生產的社會關係，並且總是以不同的方式。性徵和工具以及身體作為一種私人滿足-和功用-最大化機器的觀點緊密結合，在社會生物學的起原敘事中被很好地描述，此起原敘事著重一個基因的計算法，解釋男女性別角色優勢的必然辯證。這些社會生物學的敘事依靠把身體視為生物元件或控制學傳遞系統的高技術觀點。在許多再生產境遇的變化之中，有一個在醫學上，婦女的身體界限在”想像（visualization）”和”介入（intervention）”兩方面來說都有新的滲透性。當然，誰控制醫學解釋學上身體邊界的解釋，是

女性主義的重要議題。1970年代子宮鏡為女性對她們身體所有權提供圖像；在Cyborg的再生實踐中，手工工具不足以表達我們在現實的協商中所需的身體政治學。自助是不夠的。想像的技術撤消了用照相機拍攝的重要的文化實踐和攝影覺察的深刻掠奪性本質。性（別），性徵和再生產，在建構我們個人想像與社會可能性的高技術神話體系中是主要的參與者。

新技術的社會關係的另一個關鍵觀點是對於大量的科學與技術的勞動力，期望、文化、工作和再生產的再形成。一個主要的社會和政治的危險是強烈的二元社會結構的形成，伴隨著大量的所有種族的男人和女人，尤其是被限制在家政經濟中的有色人種，各種文盲和非專業性的冗員及無能者，從娛樂到監督和滅絕都被高技術壓抑器械所支配。適當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政治學應該在特權職位類別中強調婦女，尤其是在建構科技論述、程序和目標的科學和技術的生產中。這個問題只是女性主義科學調查中的一個可能面向，但它是重要的。新的科學實行群體在知識、想像和實踐的生產中具有什麼樣的基本作用呢？這些群體怎樣與激進的社會和政治運動聯合呢？在跨越使我們分隔的科技科層體系的同時，對婦女來說會建構什麼樣的政治責任？在聯合軍事科學技能轉變的積極行動組織中，可能有發展女性主義科學/技術政治的途境？在矽谷，許多科學和技術工人，包括高技術牛仔都不想從事軍事科學。在婦女，包括有色人種的婦女增長到相當大的數量的，專業中產階級中，這些個人喜好和文化傾向能夠與激進的政治相結合嗎？

積體電路中的婦女（Women In The Integrated Circuit）

讓我概括敘述先進的工業社會裏婦女的歷史地位，因為這些位置部分地透過科學和技術的社會關係而重構。如果它至今仍透過公共與私人範圍的可鄙意識形態來描繪婦女的生活的特性—藉由把工人階級的生活分為個廠與家庭的，把資產階級生活分為市場與家庭的，以及把性別存在分為個人與政治領域所描繪—那麼它現在是一個完全誤導的意識形態，甚至是為了表明在實踐與理論上這些二分的辭彙是如何互相建構的。我寧可選擇網路（network）意識形態的形象，表

示了空間和身份的多樣性和在個人身體及政治統一體（國家）中邊界的滲透性。“網路化”（'Networking'）既是一個女性主義的實踐，又是多國合作的策略——爲了反對派的Cyborg而編織。

因此，讓我回到早先的資訊統治描繪，並且追尋一個積體電路中婦女“位置”（'place'）的觀點，從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來看，涉及幾個的理想化社會場所：家庭、市場、有酬工作地點、國家、學校、診所——醫院和教堂。這些理想化的空間每一個在邏輯上與實際上都意味著另一個所在地，或許類似於全像攝影的照片。我提議藉由新技術調節和增強的社會關係間的交互影響，以幫助規劃所需的分析和實踐工作。但是在這些網路裏沒有婦女的位置，只有對婦女的Cyborg本身來說非常關鍵的差異和矛盾幾何學。如果我們學會如何理解這些權力網路和社會生活，我們可以學習到新的聯結，新的聯盟。從“身份確認”的；單一自我的立場是無法閱讀下面的列舉的。問題是分散的。任務就是在離鄉背井的族群中存活。

家庭：婦女主導的家庭，短暫的婚姻，男人的離去，獨居的老婦，家務工作的技術，有酬家務工作，家庭剝削工廠的重新出現，以家庭爲基礎的商業和遠距離通訊，高科技鄉村別墅，城市無家者，移民群，模組建築（module architecture），深化核心家庭，嚴重的家庭暴力。

市場：婦女不斷的消費工作，近來以購買新技術生產的大量的新產品爲目標（尤其是在工業化和正在工業化的國家中的競爭中，爲了避免大量失業的危險而需要爲了不十分需要的商品去發現更大的新市場）；二元形態的購買力（bimodal buying power），伴隨著以大量富裕群體爲目標的廣告業，和對以前的大眾市場的忽略；在與高技術、富足的市場結構平行的勞動和商品中非正式市場的重要性正在增加；監督體系透過電子資金的轉移；加強市場經驗的抽象化（商品化），導致了無能的烏托邦（ineffective utopian）或同樣的社區諷刺理論；市場/金融體系的極度流動（抽象的）；性別和勞動市場的互相滲透；強烈的性別化與疏離的消費。

有酬工作的地點：極度的性別和種族的勞動分工，然而，在特權職業的類別中白人婦女和有色人種的數量大量增加；新技術影響了婦

女在辦公室、服務業、製造業、(尤其是紡織業)、農業、電子業方面的工作；工人階級的跨國重組；新的時間安排促進了家政經濟（彈性時間，部分時間，超時，無時間）(flex time, part time, over time, no time)；家庭工作和戶外工作；雙層工資結構的壓力增加；由於沒有經驗或是對被穩定雇用沒有未來期望，遍及世界有著大量的依靠現金（cash-dependent）的人口；大多數勞動“邊緣化（marginal）”或“女性化（feminized）”。

國家：福利國家的持續衰落；地方分權伴隨監督與控制的增強；依據電訊學的公民身份；帝國主義和政治權力廣泛地形成了資訊富有與資訊貧乏的區分；高技術軍事化的增強越來越遭到了諸多社會群體的反對；由於公職工作的培育成本提高造成文職工作的縮減，伴隨著非白人女性職業的流動；物質、思想體系生活與文化的私有化發展，將私有化和軍事化，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個人的高技術形成與公共生活緊密結合；不同的社會群體彼此看不見，與抽象對象藉由信任的心理機制相聯繫。

學校：高技術資本需求和在所有層次的大眾教育的結合加深了；由於種族、階級和性別的區分，管理階級專注於教育改革，歸還革新教育民主結構予老師及孩童，對無知大眾的教育以及終止技術專家政治和軍事化文化；在反對的和激進的政治運動中增長的科學神秘的崇拜；白人婦女和有色人種之間持續的相對科學無知；由於科學為基礎的跨國企業(尤其是電子業-和生物技術公司-依賴夥伴)，使得教育(尤其是更高的教育)朝工業取向發展；許多受過高等教育者在這日益二元化的社會中。

診所—醫院：機器—身體的關係強化了；重新修訂了傳送個人的身體經驗的公眾象徵，尤其是在與再生產，免疫系統功能和“壓力（stress）”現象有關的方面；再生產政治的強化，回應了婦女未被察覺的世界歷史的寓意、有關再生產的潛在的控制；新的歷史性特殊疾病顯現；對高技術產品和過程侵害環境而帶來的健康意義和手段的抗爭；健康工作繼續的女性化；加強對國家的健康責任的努力；大眾健康運動的意識作為美國政治的一個主要的形式持續發展。

教堂：電子的基本教義派（Electronic fundamentalist）“超級援助者”傳教士隆重宣示使電子資本和機器拜物已合而為一；在對軍事化國家的抵制中，教堂的重要性增強，致力於宗教中婦女意義和權威的奮鬥；在政治鬥爭中，靈性與性（別）和健康持續交織在一起。

對統治資訊學特性的唯一描述是不安全感和文化貧乏的巨大加劇，伴隨著由於極為脆弱因而生存網絡普遍不足的情況。由於這幅圖景中許多都與科學和技術相互交織，所以提出科學與技術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急切性是清楚的。這是現在進行的狀態，而且政治上的任務相當多。

舉例來說，發展婦女在有酬工作的集體鬥爭形式的努力，像 SEIU's District 925⁴，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應該是優先思考的事。這些努力不理會勞動過程的技術改組和工人階級的革新。這些努力也提供了對更廣泛的勞動組織種類的理解，包括社區、性徵和在大部分白人男性工會成員無法避免的家庭問題。

與科學和技術的社會關係相關的結構的重新安排引起了強烈的矛盾心理。但是也沒有必要為20世紀晚期與工作、文化、知識的生產性和再生產所有方面相關的影響而沮喪。由於出色的推論，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有效地看到了這種支配，並且費心理解何者只能視為虛假意識以及人們在晚期資本主義中，他們自身的統治共謀關係。記住失去什麼是重要的，或許特別是從婦女的觀點，往往是致命的壓迫形式、卻戀舊地歸順於當前的侵犯。面對高科技文化的拙劣調解的矛盾心理，不只需要將意識歸類於“穩固的政治認識論”(solid political epistemology) 對抗“虛假意識的操控”(manipulated false consciousness)，而更需要理解新興的期望、經驗與權力，以及改變這遊戲的規則。

據此有理由對新興的整合體抱持希望，其跨越種族、性別和階級，這些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分析她們自身遭受各種不同變化的基本元素。遍及世界的困苦加劇與科學和技術的社會關係的關聯性是強烈

⁴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s office workers' organization in the US.

的。但是人們所感受的卻不是十分清晰，並且我們缺乏足夠細緻的集體構建有效的經驗理論的聯繫。當前的努力——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分析的、女性主義的、人類學的——在闡明“我們的”經驗方面都是未盡完全的。

我意識到由我的歷史位置提供的新奇的觀點——由於Sputnik對美國國家科學教育政策上的影響，對一個愛爾蘭天主教女孩來說，她有可能成為一位生物學的博士。我有身體和心智，正如被婦女運動所建構一樣，同樣被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軍備競賽和冷戰所塑造。有更多的理由將希望集中於政治規劃上為了產生忠誠的美國技術專家政治主義者造成的對立結果，它也產生大量的意見不同的人，而不是關注於當前的挫敗。

這種永久的女性主義觀點的partiality在我們對於政治組織和參與的形式的希望上具有重要性。我們不需為工作的成功而需要全部。女性主義夢想中有一種共同的語言，想要一個非常真實的語言的所有理想，屬於一個完美如實的經驗命名，是整體化的和帝國主義的。在那意義上，辯證法也是一個理想的語言，希望解析矛盾。或許，諷刺地說，我們可以從我們與動物、機器的融合來得知怎樣不成為（男）人類，西方理性的化身。從這些有影響力但也是禁忌的融合的觀點中，藉由科學與技術的社會關係，產生一種不可避免的，或許就是一種女性主義科學。

Cyborg：一種政治身份的神話

(Cyborgs: A Myth Of Political Identity)

我想以一個關於身份和邊界的神話來作結，其表明出二十世紀晚期的政治想像力。在這個故事中，我受惠於Joan a Russ, Samed K .Delany, John Varley,James Tiptree, Jr. Octavia Butler,Monique Wittig, 和Vonda McIntyre。探索在高技術世界應該強調什麼的故事中的敘說者。他們都是Cyborgs的理論家。在探索身體界限和社會秩序方面，人類學家Mary Douglas（1966，1970）幫助我們意識到身體意象對世界觀點，進而對政治語言來說是多麼重要。

法國女性主義者，像Luce Ingaryt 和Monique Wittig，藉由她們的所有分歧，知道怎樣寫身體；怎樣從化身的意象編制性本能，宇宙論，和政治學，尤其是Wittig，以身體片斷化和重建的意象為起始。

美國激進女性主義者像Susan, Audre Lorde, 和Acboienne Rich 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政治想像力—或許對我們所視為友好身體和政治語言的東西限制得太多。他們堅持了有機論，反對技術論。但是，她們充斥著有機體說的符號體系和的生態女性主義和女性主義異端的相關立場，只能在Sandoral 的適合二十世紀晚期的反對的意識的詞語中才能理解。她們僅僅使未專注於機器和晚期資本主義意識的人產生迷惑。在那個意義上，他們是人機合體世界的一部分。而且由於明確地接受固有有機論和機器之間清晰分歧以及建構西方自我的相同分歧崩解的可能性，女性主義者有了極大的豐富。就是這種同時的崩解打破了支配的母體並且開啓了幾何學的可能性。從這種個人的和政治的“技術”污染中可能學到什麼呢？我注意到兩個部分重疊的群體，觀察關於可能有益的Cyborg神話的建構主題：非白人婦女以及在女性主義科幻小說中荒謬自我的建構。

更早的時候我便提議“非白人婦女”或許可被視為人機合體代表，一種從外界身份的溶解和她的生命神話（biomythography）的複雜的政治—歷史階層而來的有力合成物（Zami,; Lorde, 1982; Kirog, 1987a, 1987b）。物質的和文化的交錯描繪了這個可能性。Audie Lorde, (1984) 在題為Sister Outsider的文章中就抓住這個論調。在我的政治神話中，Sister Outsider是一個離岸的（不受限制的）女性，美國勞工、女性和女性化的都應被看作阻止她們團結，威脅她們安全的敵人。岸上的，美國邊界內部，Sister Outsider是女性在相同產業中的種族和民族身份被運用於區隔、競爭和剝削時的一種潛在可能性。“非白人女性”對以科學為基礎的工業來說，是受偏好的勞動力，對廣泛的性市場，勞動力市場，再生產政治來說是真正的婦女。在性產業和電子裝配中被雇用的年輕的韓國婦女是從高中所招募而來，她們為了受到聚集而接受教育。讀寫能力，尤其是英語，使這些“廉價”的女性勞動力對於跨國企業來說，特別有吸引力。

與東方學的“口述（文化）傳統”不同，讀寫能力是非白人婦女的特殊印記，這些是美國黑人婦女與男人同樣通過冒死亡之險來學習和教授讀和寫的歷史所習得的。書寫對所有開拓殖民地群體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書寫對於西方神化，即區分口述與書寫的文化、開化的和未開化的智力，以及最近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對於西方父權主義抨擊——就是它的一神論崇拜、陽物崇拜、專斷的、單一的工作、唯一的和完美的，這些方面來說都是重要的。書寫意義的爭論是當代政治鬥爭的主要形式。放棄這種書寫活動是極度危險的。美國非白人女性的詩和故事重複地講書寫，象徵權力的獲得，但是這次那個權力一定不是陽物崇拜的，也不是純粹的。Cyborg的書寫必然不關乎人的墮落（the Fall），在語言之前、書寫之前、人類之前的從前的一切想像。Cyborg的書寫是關於生存權，不是在原始純粹的基礎之上，而是在掌握了標示世界的工具的基礎之上。這些工具經常是故事、重述故事，以及倒轉和剔除了自然化本體的科層二元論的改編本。在重述的起源故事中，Cyborg者推翻了西方文化源頭的中心神化。我們都被那些起源神話殖民化了，伴隨著它們渴望實現於天啓中。對女性主義Cyborg最關鍵的父權主義的起源敘事被建立在文字技術中——書寫世界的技術，生物技術和微電子技術——近來編寫我們的形體如同C31方格的符碼問題一般。女性主義Cyborg的敘事有個任務，就是對訊息與智能重新編碼，以破壞指揮與控制。

象徵性地和從字面上看，語言政治遍及非白人女性的奮鬥；而且關於語言的故事在美國非白人婦女的當代大量的寫作中有著特殊的權力。舉例來說，重述本地婦女 Malorche 的故事，新世界混血兒的母親，精通語言，國會的女主管，這對墨裔美國人身份的建構傳達了特殊的意義。Cherrie Moraga（1983）在《Loving in the War Years》探索了身份的主題。當一個人從來不擁有原有的語言，從來不講述起源敘事，在文化領域從來不存在於合法異性戀的和諧中，因就不能把身份奠基於神話或是純粹且正當的視為自然給定，母親的或父親的。Moraga 的作品中，她卓越的讀寫能力，呈現在她的詩歌，如同 Malinche 對征服者的語言之掌握，是同樣的反叛——使倖存成為可能的一種反叛，一種不合常規的生產。Moraga 的語言不是一種“整體的”，它是一

種自身-有意識地（self-consciously）接合，一種英國的和西班牙的怪物，兩者都是征服者的語言。但是它是空想的怪物，在反叛之前並未對其要求一種原初語言，其具有非白人女性之侵蝕工藝、充份、有力的身份。*Sister Outsider*顯示倖存的可能性不是因為她的純真，而是因為她在邊界生存的能力，在沒有原初整體的創始神話下去寫作，伴隨著不可避免的末日天啓，那種想像成為純真與全能的母親的致命單一性，在憑藉她的後裔撥付身份最終部分得到解放。書寫標示了Moraga的身體，宣稱它的非白人女性身體身份，抗拒逐漸成為盎格魯父權的無記號類別，或是進入”最初無知”東方學家的神話。Malinche在此是母親，不是之前偷嚐禁果的夏娃。書寫證明了*Sister Outsider*，而不是女性屬於男人的男權家庭的書寫之中。

書寫是Cyborg的卓越技術，深印於在二十世紀晚期。Cyborg政治是為語言而奮鬥，它反對完美的交流，反對完美地轉化所有意義，反對父權主義中心法則。這就是為什麼Cyborg政治堅持一定要噪音並且擁護污染，為這種不合常規的動物與機械的融合而欣喜。這是樣的結合讓使男人和女人是如此的不確定，顛覆性慾的結構，這影響展現在語言和性別上，因此顛覆”西方的”此一再生的結構和模式、自然和文明、鏡子和眼睛、奴隸和主人、肉體和心靈。”我們”原本不會選擇成為Cyborg，但是我根據一個自由的政治學和在對文本更大的重複之前設想個人再生的認識論而進行選擇。

通過對Cyborg的前景的展望，將藉由聯合各種優勢壓迫的“我們的”特權地位、只是侵犯的純真、較接近自然的理由等基礎的政治解放，我們能夠看到強有力的可能性。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運行於西方的認識論基礎之上，而從一種科層體制壓迫的視角，以及/或者一種道德上的優勢、純真、與自然極為相似的可能立場，來建構一革新的主題。沒有一種可用的的共同語言的原初夢想或者原本的期望從敵對的“男性”分離中得到保護的共生。而且在一個沒有最終閱讀權利或救贖歷史的劇本中，依據完整的牽連來確證”自身”，將我們從植根於對身份確證、先鋒團體（vanguard parties），純粹和母性化的政治中解放出來。剝去身份，混血人種如同Malinche般教授了邊緣的力量，以

及母親的重要性。非白人婦女從一個恐懼男權主義的不幸的母親改變成爲一個領悟生存的新時代具讀寫能力的母親。

這不僅是文學上的解構，而且是 liminal⁵的轉化。每一個開始於原初的純粹和有權回歸完整的故事，把生命的劇本設想爲賦予個性，分離，自我的誕生，自治的悲劇，進入寫作、疏離；因此，抗爭在他人內部中虛幻的緩和。這些情節被一種再生產政治——無缺陷的再生，完美，抽象所操縱。在這一情節當中，婦女被設想爲若非更好就是更壞，但都一致認同她們很少具有自我、僅有懦弱的個性、僅能口頭表達、成爲母親、很少對父權產生危害。

但是還有另一對父權較低危害的途徑，一個未經過女性、原生的、零、反映階段以及它的想像的路徑。這是通過婦女和其他不由婦女產生的當前、不合一般常規的cyborg，她們拒絕爲了得到真實的生活，而犧牲的思想上資源。Cyborg是一批藉由書寫，拒絕在角色中消失的人，無論有多少“西方的”評論者談論關於另一個早期、藉由“西方的”技術而從事其中的生物群體的悲傷經過。這些現實生活中的cyborg（例如，Aihwa Ong所描述在日本以及美國的電子公司工作的東南亞農村婦女）她們都積極改寫關於她們身體和社會的文本。Sumival是這一閱讀劇本的支持。

扼要復述一下，某些二元主義一直持續在西方傳流中；它們全都有系統的存在於邏輯以及婦女、有色人種，自然，工人，動物的支配實踐上——簡言之，所有控制設定他者，其任務就是反映自身。這些令人煩惱的二元論主要是自我/他者、心靈/身體、文化/自然、男性/女性、文明/野蠻、實質/表像、整體/部份、動機/手段、創造/被造、積極/消極、正確/錯誤，真實/假像，總體/局部，上帝/人。自我不是起主導作用的，他只有通過他者來認識自身，他通過掌握主導地位的經驗來認識自身。這種經驗給予他自我治理的根據。成爲個人就意味著成爲自我管理，成爲強有力者，成爲上帝；但是成爲個人同時也意味著成爲一個假象，並且，因此被包含在與他者啓示的辨證法中。然而，成爲他者，就意味著成爲多元的、無清晰邊界的、開放的，無實質的人。

⁵ 門檻的、門口的、最初的、開端的，閾限、過渡。

一個太少，但兩個又太多。

高科技文化以具策略的方式挑戰了這些二元論。在人和機器之間，誰創造，誰被創造已不明確。在成為編碼實踐的機器中，什麼是心靈，什麼是肉體已不再清晰。在我們於正式的論述中，還是在日常的實踐活動中理解自身的範圍之內，我們發現自身變成Cyborg，混種的，鑲嵌的，成為怪物。生物有機體變成生物系統，如同其他的交流設備。在我們關於機器與有機體、科技的與生物的正式的知識中，沒有基本法則，以及本體論的分離。在Ridley Scott電影Blade Runner中Rachel代表了一個Cyborg文化的恐懼，愛和混亂的形象。

一個結果就是我們的意識與我們工具的聯繫提高了。許多電腦使用者熟練地將出神的狀態變成科幻小說電影和文化戲謔的題材。或許下身麻痺者或其他嚴重殘疾病人對這種與其他裝置的異種結合，能有最深刻的體驗。Anne Mdaffrey的前女性主義（pre-feminist）作品 *The Ship who Sang* (1996)揭示了一個Cyborg的意識，女孩的大腦與複雜的機器的合成體，形成於一個嚴重殘疾小孩誕生之後。性別、性徵、化身、技能：所有都在故事中被重新塑造。為什麼我們形體以外皮為目標，或是說其他生命部分必須被裝入皮膚之下？從十七世紀到現在，機器是能被賦予生命的一給予他們有靈性的靈魂讓他們說話、運動或者說明它們有條理的發展和心智慧力。或者生物有機體能夠被機械化—減少身體被理解為心靈的來源。這些機器/生命有機體的關係是過時的，不必要的。對我們而言，在想像力與其他的實踐當中，機器成為輔助的裝置，親密的組成部分，友好的自我。我們不需要有機體整體論來產生不可滲透的整體、女性的總體和她的女性主義的變體。讓我藉由本文第二部分—女性主義科幻小說中對這cyborg怪物邏輯進行部分的解釋，以斷定這個觀點。

Cyborg殖民於女性主義者的科幻小說當中，使得男人或女人、人類、人工製品、一個種族的成員、個體的終結，或者身體等產生不確定性。Katie King闡明了在閱讀這些大部分不基於確定性的科幻小說時，是多麼的愉快。學生們第一次面對Joanna Russ時，他們毫不畏縮地接受現代主義作家如James Joyce或者Virginia Woolf，他們不知道

The Adventures of Alyx或The Female Man的材料為何，當希望其中是英雄主義的，充沛的性本能和嚴肅的政治時，故事中角色拒絕讀者對純粹的完整性的尋求。The Female Man是關於一個基因型四個版本的故事，他們全部相遇，甚至聚合在一起的卻並沒有組成一個整體，解決了強烈道德行為的困境，或者消除了與日俱增的性（別）醜聞。

Samuel R. Delany 的女性主義的科幻小說，尤其是 Tales of Neveun，通過重做早期的革命，來嘲弄原始的敘事，通過重演西方文明創始進程以顛覆它們自身的真實性。Janes Tiptree, Jr，其的小說在她的”真實”的性別被露之前一直被認為特別具有男性氣概，此書編造了重新建立在非哺乳動物科技基礎之上的諸如通過雄性孵卵，育兒以及雄性養育幼兒來選擇後代的神話。Jahn Varley在他的Gaea⁶，這一主要的女權主義研究中創造了一個超級Cyborg，一個瘋狂的女神—行星—策略家—老婦人—科技化裝置在post-cyborg共生的特殊配置中被孕育了。Octavia Butler描述了一個非洲女巫運用她的變化的力量來對抗她的對手對遺傳的控制（Wild Seed），描述時間的扭曲把一個現代美國黑人婦女帶進奴隸制，那種白人雇主的相關行為決定了她自己出身（血緣）的可能性，以及一個被收養的混血兒對於自身身分與共同體認知模糊的地方。在Dawn中（1987），Xenogenesis連載小說的第一部分，Butler講述了Lilith Iyapo的故事，他的名字使人想起了他的第一位並且已離異的妻子，他的姓標誌著她作為一位移民到美國的奈及利亞後代的寡婦的地位。一個黑人婦女並且是一個失去孩子的母親，Lilith通過與外星情人/援救者/破壞者/遺傳工程師的基因交換調節人性的變化，他們在原子彈大爆炸後改變了地球的居住環境，強迫活著的人類與他們親密融合。它是一本對二十世紀末由種族和性別所建構，在神話領域中再生產、語言和核心政治質問的小說。

因為它含有許多關於界限上的違反情況，Vanda Mdn-tyre的Superluminal編納了這種大有可為卻又危險的怪物，這種怪物有助於重新界定具體化和女性主義的寫作。在小說中，沒有角色”僅僅”是人類，人類的狀態是極為模糊的。Orca，一個基因改造後的潛水夫，能

⁶ 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女神。

夠跟殺人魔鯨魚對話而在深海中存活，但是她渴望如同一個領航員般探索空間，使得危害她與潛水夫和鯨類動物的親密關係的仿生學的增強移植成為必要。這些變化是新發展密碼的細菌媒介、移植手術，微電子設備的植入、相似體和其他方式的所產生的結果。**Laenea**由於接受了一次心臟移植手術，和一系列使他能用超過光速的速度運行而存活的變化，而成為一個飛行員。

Radu Dracul倖免於一場在他的外部世界由病毒導致的瘟疫，他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時間意識，其改變了對整個物種空間感知的界限。所有的特質都探究了語言的限度；交流經驗的夢想；以及限制、偏愛、親密、甚至在這個世界上的千變萬化和聯繫的必要性。**Superluminal**也代表了在另一個意義上的**cyborg**的明確的矛盾；它在文本意義上強調了我在文章已暗示的科幻小說中的女性主義理論和殖民論述的交叉。這是與很長歷史的連結，許多“第一世界”的女性主義者試圖抑制，包括在在閱讀**Superluminal**中的我自己也是這樣，在這之前它被**Zoe Sofoulis**所描述，**Zoe Sofoulis**處於世界體系的統治資訊學的不同位置，使得她敏銳地留意所有科幻小說文化的帝國主義時刻，包括女性科學。出於一個奧大利亞女性主義的敏感特質，**Sofoulis**記起**Meintyro**在電視影集**Star Trek, Captain Kirk**和**Spock**的冒險故事中扮演的作家角色，比他重寫**Superluminal**中的虛構故事來得容易。

怪物總是清晰地侷限於在西方想像共同體的之中。古希臘的半人馬（**Centaurs**）和亞馬遜族（**Amazons**）透過戰士與動物界、女性親密關係的崩解以及界限的汙染，建立了對希臘男性公民的中央選舉的限制。未分割的雙胞胎和陰陽人在早期現代法國被認為是混亂的人類形體，它們是基於自然和超自然，醫學和法律，異常和疾病的論述——所有確立現代性本體的關鍵。關於猴子和黑猩猩的進化論和行為科學標示了二十世紀晚期工業化本體的多元界限。**Cyborg**在女性主義科幻小說中確定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可能性並且受那些男人和女人的世俗小說所限制。

不將**cyborg**視為我們的危害物，會帶來幾種結果。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身體是權力和身份的構圖。**Cyborg**也不例外。一個**Cyborg**

的身體並不是純粹的，它並不是在花園裏誕生；它不尋求單一的身份，因此對二元論產生無盡（或到世界盡頭）的反對；它視反諷為理所當然。一個太少，兩個只是一種可能性。在技術，機器技術上的強烈的興趣，不再是一種罪惡，而是具體化的一個觀點。機器不再是模擬生命體的，被崇敬的和被控制的東西，機器是我們，我們的行為，我們具體化的一方面。我們可以對機器負責；它們沒有支配和威脅我們。我們對界限承擔責任。我們就是他們。直到現在，（一段時間以來），女性化身似乎是被給定，有機的，必然的；女性化身似乎意味著作母親的技巧和隱喻的擴展。只有超乎其外我們才能由機器獲得強烈的滿足，然後有理由說這畢竟是一種適當的女性的基本活動。Cyborg或許更嚴肅地意識到局部的，易變性，以及某些時間的性與性別化身的觀點。性別或許終究不是全球身份（global identity），即使它具有歷史的廣度和深度。

意識形態的難題，如什麼才能視為日常活動、體驗，可以利用Cyborg形象的來處理。女性主義者近來宣稱婦女被給定了日常生活性質，婦女在某種程度上比男人更多地承擔日常生活，因而潛在地具有其特定的認識論邏輯位置。這一宣言具有令人信服的一面，它使不受重視的女性活動變得引人注目，並且根據生活的基礎來命名。

然而，生活的基礎是什麼？關於所有婦女的無知，所有知識和技藝的排斥和失敗的情況是如何？男人又怎麼獲得日常能力，知道如何建造物體，拆解它們操作它們？其他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Cyborg的性別一種局部的可能性，以獲取全球性的復仇。種族，性別。資本需要一種整體和部分的Cyborg理論。Cyborg無意去創造一個總體的理論，但是對界限建構和解構卻有深切的體驗。有一個神話（虛構/想像）的系統，等待成為一種政治語言來建成構一種看待科學和技術的方式，並且挑戰統治的資訊學——為了更有力地行動。

一個最後組織體的和有機體的影像，整體的政治學依賴於再生的隱喻和總是要求生殖性（別）的對策。我認為Cyborg大多數以再生方式處理，並且對他們的生殖母體和多數的生育產生懷疑。對於螻蛄來說，受傷後再生，比如失去一肢，它包括一種結構的重新組合，伴隨

著不斷交織的可能性的功能的恢復，或者其他的在以前受傷的位置上的奇怪的構造上的生產，再生的肢體可會很怪異，也可能完全一樣，也可能更強有力。我們都受傷了，深深的受傷了。我們需要再生，而不是復活，以及我們改組一個如我們渴望，沒有性別的烏托邦的夢想世界的可能性。

在本文中的Cyborg想像，可以有助於表達兩個關鍵的論點：首先，一般的研究成果中，整體化理論是一個主要的錯誤，它遺漏了現實情況的大多數，可能一直是這樣，但現在是確定的。其次，承擔起科學和技術的社會關係的責任，就意味著拒絕一種反科學的形而上學，一種技術的魔鬼信仰，因此就意味著接受重構日常生活邊界的技術任務，這些存在於他者有部分聯繫中，存在於我們所有部分的交流之中。科學和技術不僅僅是人類巨大滿足的可能途徑，也會是複雜統治的母體。Cyborg的想像能提供一條走出二元論迷宮的方法，藉此來解釋我們自身的形體和我們的工具。這不是一個共同語言的夢想，而是力量強大的無信仰異形結合體（heteroglossia）。它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以此來言說抗拒新權力的超級拯救者的範圍之想像。它意味著機器，身份，種類，關係，空間敘事的建立和破壞。雖然兩者附著旋轉起舞，但我寧願成爲一個Cyborg而非女神。

關於 Donna Haraway⁷

Donna Haraway 出身於愛爾蘭的天主教家庭，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是靈長類動物學家、科學史家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任教於聖克魯茲加州大學的意識史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前身是宗教系，雖然和Haraway的出身背景相合，但是 Haraway 的強硬社會建構主義（strong social constructionism）觀點完全說明了他對天主教的反叛。

Haraway 的生物學背景和對靈長類動物的研究，使她發現性別和科學研究是密不可分的，以往從男性靈長類學家的研究中，雌猩猩往往是被動的、不具支配與主要地位。但是女性靈長類學家的研究則顯示了完全相反的行為描述。可見，科學家的性別與其所內化的社會價值觀會主導研究者的觀察與科學理論，於是以雌靈長類為研究對象的這些女性靈長類學家不僅是取得彼此身份的認同，更重要的是從女性主義角度重新來檢討與批判科學的中立性。

Haraway 的強硬社會建構主義觀點除了挑戰大一統的科學論述外，更進一步的挑戰女性生命所代表的自然本性與本質主義，強調性（別）亦是社會建構之文化產物，並無根本的同一性與不變性。因此，與Sandra Harding 的客觀性主張不同的是：Haraway 著重的是並無所謂的單一的女性主義知識優勢的立場論，有的只是多元的女性生命與不同的經驗。

由此可理解，Haraway 的強硬社會建構主義也是一種立場論，否定存在所謂如上帝般的全知和全識（視）的超越世界觀點，強調個人社會生命與知識、權力的互為決定性。

⁷ 摘錄自吳秀瑾〈關於唐娜•哈樂葳〉。喬治•邁爾森（2002）《唐娜•哈樂葳與基因改造食物》，台北：貓頭鷹。頁 9-25。